

長期和平之診斷

陶希聖

一

我們不是預言家，但向將來的展望與推測，不是不可能的。向將來的展望與推測，一不應滲雜主觀的希望，二不應放過社會最近的變遷。

以主觀的希望當做事實，這是我們最易陷入的錯誤。站在政府立場的常抱有政權安定的希望，因此常就政權安定的可能性方面著想，於是他便竟以為政權安定了。反之，反政府派常抱有現政權動搖的希望，因此常追尋政權不安定的原因，於是便竟以為現政權崩潰了。

現社會是各種不同的意志交錯而成的。多數不同的意志之中，每一意志常感覺牠不能夠如願實現。但牠常希望自己的實現。我們知道意志是決定於存在的。社會的存在，造成歷史，然而常不能如其所欲以造成歷史。所以每一意志常感覺社會現象的推移變化是超越自己的。

人們對於超越自己的社會現象的推移變化，在科學還沒有發達到解除宗教迷信的時代常認為神秘。科學雖把宗教迷信中鬼神觀念打破了，然對於社會現象的瞭解還沒有充分，對於社會現象推移變化的法則還沒有透悉，故雖在今日，社會現象的推移變化對於我們還似有相當的神秘性。陷入這種神秘性的人，對於社會最近的變化，無從瞭解，因其不能瞭解，也就不願注意。

即如一九二五年的中國革命，此革命經過以後，中國社會有無重大的變化？中國的政治權力的性質有無與從前相異之點？有些人的答案是消極的。他們對現社會現政治現革命階段的認識，仍與對一九二五年以前者相同。他們的理論戰略戰術仍然與一九二五年以前無別。這種人對於最近長期內戰之中社會政治可能的變化，當然更無從認識。

本文只提出兩種社會的變化，作為推測將來的依據。

第一是一九〇〇年以來日益加速的經濟的變化。一九〇〇年可以假定是世界工業資本主義轉化為金融資本主義的一年。恰好這年以後，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方法有一轉變。從形式上說，在此以前，列強對中國取政治手段，如取得租借地、劃定勢力範圍、取得鐵路建築權及礦坑開採權等。他們對中國的政策自一九〇〇年而一變為純經濟侵略。除後起工業資本主義國日本以外，他們放棄勢力範圍、主張門戶開放、取得鐵路礦產投資權。自實質上說：一九〇〇年以後，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是推銷廉價商品及作工業的開發；換句話說，這時期的政策是工業資本主義必然的進路。一九〇〇年以前，他們注重於政治借款，實業投資，換句話說，即輸出資本的金融資本主義政策。

外國資本的進口，對於中國經濟當然起相應的變化。中國本來有二千年來不斷發達的商人資本。票號、錢莊、銀鏰，已有日益強大的勢力。這種商人資本是依於農產物及手工製造物的交換而存在的。票號、錢莊、銀鏰是經營商人資本最高形式的貨幣資本的業務。這種金融資本與強有力的外國金融資本——以大工業經營的基礎的金融資本相遇，其結果是不言而喻的。一九〇〇年以後，是中國商人

資本與外國金融資本合流，是前者向後者投降的時期。中國商人資本被吸收被隸從於外國金融資本之下。票號、錢莊、銀鏰，或改形為銀行，或附從於銀行之下，而皆為外國銀行之支店。

如果說票號、錢莊、銀鏰的鼎盛是明末清初以來的事情，則我們還可以舉出比三者更古的金融組織，即農業金融機關之典當。此最古之金融機關，現皆隸屬於銀行錢莊之下，即隸屬於外國銀行之下。

商人資本的發達，是以農民為犧牲的。商人資本雖使生產益進為商品生產，但亦有以販賤賣貴及高利貸借而破壞小生產者的作用。所以商人資本特殊發達，便是說生產落後的意義。

外國商品把中國的生產更加以重大的壓迫。凡外國商品所到之處，便是中國生產衰落之處。不衰落的生產，也逐漸適應外國工業的需要，尤隸屬於外國金融資本的勢力。生產雖然衰落，商業與高利貸卻仍舊繁榮。商業與高利貸得到外國資本雄厚的供給，且更比從前有加無已。

因此，近年來中國社會，釀成農業衰落、商業繁榮、金融資本獨特發達的畸形狀況。

農村半自足經濟因商業資本（受外國商品的催迫及外國

金融資本的援助）擴大影響而愈益破壞。窮鄉僻壤，都有日益轉化于貨幣經濟的境遇。農村附從于小都市，小都市附從於大都市，大都市附從於國際都市。

近來中國經濟的變化，就是一則農村衰落而都市繁榮的對蹠，二則農村愈益附從於都市；農村資本附從於都市資本，最後附從於國際都市的資本。

三

農村附從於都市的趨勢是漸進發達的。在公元前三〇〇年，手工業發達的齊國，有七萬戶的大都市；而農業發達的秦國，有盛大的商品市場；黃河流域的腹部也有不少的大都市。公元元年之際，鹽鐵酒酷及貨幣資本，已為農民所必仰給於都市的東西。公元六〇〇年以後，黃河流域的農業手工業生產漸衰而生產區域移在江南。商業市場也由北而南，揚州、廣州或為國內大都市，或為國際大都市。與西洋海道交通既開之後，沿海都市逐漸發達。到近來則上海與天津等口，大見繁榮。

一國之政治中樞，常隨商業都市而移轉。二千年來，中國都城由長安而洛陽，由汴梁而南京，由北京而南京。漕運及其他商品流通的中樞常為政治的中樞。

史家常重視地理的形勢。殊不知地理的形勢對於社會經濟及政治的影響，隨社會生產方法之進步而不同。如關中，在公元前三百餘年之時，有支配中國的實力。史家常以為這是由於關中對於中原有建瓴之勢。其實當時關中所以能控制中原，是由於農業以及商業最為發達。關中財富，這時候居「天下十之六」。所以秦有征服六國的威風，漢有統一中國的實力。各地生產方法之變遷，以及由於此之交換方法的變遷，使控制中國的中心亦相隨而轉易。

從前的都市，依國內市場而定其運命。現在的交易，最重要的是外國商品的交易。不獨有外國工業品交換中國農產品，抑且中國工業品也有出口，外國農產品也有進口。國內農業生產無論如何衰落，外國商品的交易仍舊可以繁榮。外國商品進口及中國商品出口最多的都市就是最有控制中國的勢力的都市。

因農業生產衰落，國內市場的大都市沒有控制國際市場的都市之力。反之，因金融商業資本在外國資本之下特殊發達，國際市場的都市有控制國內市場的都市之力。

四

以一般社會經濟而論，中國是落後的。但這並不是說中

國內沒有最進步的生產技術與資本組織。中國大都市有電氣運轉的最進步的機器工廠。中國大都市也有最完備的銀行組織。

這些組織是外國傳來的。然而外國傳來的組織已在中國經濟構造中獲得領導的地位。上海有紐約式經濟社會生活，這並不是與內地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生活沒有相互關係的。上海的繁榮不是由於單純的紐約模倣，乃是由於此地有以內地農業經濟的犧牲而特殊發達的金融資本組織。

依於同樣的推理，中國一般的社會技術雖然落後，却並不是說中國沒有最進步的軍事技術。這種技術是外國傳來的，但與內地最原始的械鬥之間並不是沒有交互的影響。民間的木棍刀鎗，轉變為毛瑟機噐。而歐戰時代的戰鬥工具，為中國軍隊所運用。從來一有接觸即時解決的戰爭，竟轉化為延宕七個月的大量的長綫的主力戰。

從辛亥革命到一九二六年是軍事系統分化的時期。清末訓練的新軍，一度試用於推倒滿清，回頭又用於鎮壓革命。革命鎮伏以後，忽發現一軍閥政權安定的時期。他們於安定之中，有各逞私慾，各求地盤的機遇。他們都是從同一系統分散下來。而當時中國經濟的發達，還沒有達到金融資本取得導領的程度。

歐戰時期，中國工業得到特別的進步。民主革命受了刺激。社會運動突然進展。軍隊首長還沒有感覺革命的可怖。並且當時各大都市有平衡的發展。各地軍隊注意於地盤的爭奪，而各地軍閥有平衡的勢力。一時軍事系統有分散的趨勢。

戰後列強急於資本的投出。中國工業的發達既刺激商業金融資本使其發達以後，中國工業自己轉入衰落，而商業金融資本卻依附於外國資本，不因此而衰落。內地農業受不住都市商業金融資本的蓄積及外國商品的競爭，乃急進于破壞之前途。不過數年，農村衰落與都市繁榮，內地衰落而海口繁榮的趨勢已成。

在此時期，革命的發展乃竟於舊來軍事系統之外，加入一新系統，為北方軍閥之大威脅。革命的發展與金融商業資本的集中，使各地軍事系統集中，一變從前分散的現象。由此而最近戰爭有劇烈及持久之兩性徵。

五

從以上兩點——經濟的及軍事的現象，我們敢下一個推斷：即今回內戰停止之後，有一比較從來為長的和平時期。為什麼呢？農村附從都市而都市又附從大都市，這是中

國每次割據之後必趨統一的原理，並且，軍事技術的進步，使戰爭之準備遠較從前爲不易。

但是這並不是說一切危難都渡過了。

由交換來說，雖有經濟集中如前所說的現象；由生產來說，各地的生產組織是不平均發達的。西北仍然是農業及舊商人資本社會。東北則有資本主義農業經營。長江以南，東部爲新工業及商業金融資本中樞。西部則地形上經濟上不少與外界隔離的區域。而生產的不振差不多各地同然。每一區域有依賴別的區域消納剩餘人口及補充財政的需要。在本刊三卷七號拙著統一與生產一文中，我曾指出中國的統一有最高的可能性與最高的難能性，便是指此。

僅從統一之難能性觀察，便決定中國今後仍然是每年每月不斷戰爭；以及僅從統一之可能性觀察，便決定中國今後毫無軍事政治矛盾之存在與爆發之可能。這兩個片面觀察是一樣不對的。社會常識對於一個問題的解答是「然則然，否則否」。社會科學則對於每一問題是作如下之解答：然——否，否——然。統一之難能與可能同時存在，是無可怪的事情。

今後較長期間內，最充分可能的現象是軍事和平與政治運用。

而我們所常生產的，是在軍事和平時間以內所起的社會經濟的變化。政治的運用雖可以促起戰爭或止息戰爭，而社會經濟的變化，可以使政治運用改變方向。

今後社會經濟的變化，在本刊三卷十號拙著一文中，曾經指出如下之特徵：即倘若沒有政府與國民適當的努力，則是商業金融資本的蓄積，工業的相對振興，與農業之繼續破壞；這有依於工業相對振興而引起的社會運動之漸次興起。

社會是各種不同的意志交錯而成的。一方的運動引起他方相對應的運動。對於新起的社會運動，不領導則反對。本黨的經濟政策是必須抉擇於兩者之間的。同一運動，可以引起兩種相反勢力的戰爭，又可以促進同一方面的勢力之相互妥協。

這些都是活潑的、對應的、交叉的、不是機械的、板滯的。然而我們的眼光，要當注視於較長的軍事和平中社會經濟的變化及其對政治軍事的反映。一切政策及實現政策的努力必須由此而決定。連亘數年，世異時移，而政策與口號不變，這是不合理的。忽略一切變化及其所生的結果，乃有此不合理的態度。如再加以希望爲事實的錯誤，那更不可救藥了。

